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女性的哀歌—— 论姚紫中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刻画 与其社会意义

科目编号：ULSZ3068

学生姓名：蔡哲茜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

呈交日期：2013年4月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 目	i
宣 誓	ii
摘 要	iii
致 谢	v
绪 论	1
第一节：姚紫与他的故事.....	1
第二节：研究目的.....	4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难题.....	5
第 一 章 姚紫中短篇小说女主人翁人物归类.....	8
第一节：爱国女性.....	9
第二节：平凡生活中的女性.....	11
第三节：殖民时期女性.....	13
第四节：娼妓与舞女.....	16
第 二 章 姚紫笔下女主人翁的人物塑造.....	19
第一节：人物塑造方法.....	19
第二节：姚紫笔下类型人物与典型人物代表.....	21
第 三 章 人物形象的社会隐喻与姚紫情感的寄托.....	29
第一节：女性人物所体现的社会隐喻.....	30
（一）战争背后的哀伤：向往和平与自由的灵魂.....	30
一、〈阎王沟〉：蒋桂花.....	31
二、〈秀子姑娘〉：秀子.....	33
（二）殖民时期的扭曲：背叛与抛弃的镜子.....	36
（三）战后理想的崩坏：贫富悬殊的悲哀.....	41

一、金钱物欲的追求：女人、马场女神·····	42
二、贫富差异的缩影：刘玉、丽丽·····	44
第二节：姚紫自身的情感寄托与思想·····	46
（一）关爱回望祖国：理想中的美好影子·····	46
（二）追求真理的路：迷惘与失落·····	49
余 论 姚紫 = 黄色作家？·····	53
结 语 ·····	57
参考书目 ·····	60

女性的哀歌——
论姚紫中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刻画
与其社会意义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8385

日期：

摘要

姚紫是新加坡杰出的南来作家之一，他是多方面的写手，爱国情怀、反殖民意识和现实生活中细腻的刻画等课题他皆有涉猎。在姚紫的小说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他将自我的情怀与对社会的关注透射在女主人翁身上，通过她们的形象与行为，带出了姚紫想要体现出的社会意义。

在第一章中，笔者将姚紫笔下的小说女主人翁归纳为四个部分：爱国女性、平凡生活中的女性、殖民时期女性与娼妓和舞女。不同形象的女性在姚紫笔下有着不同意义，而同一类别的女性却也能以不同的姿态表达出共同的观念，姚紫不仅表现出了其熟练的文笔，更突出了文本的层次。

姚紫如何塑造笔下丰富的女主人翁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讨论。运用了类型人物与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笔者先浅析这两种人物的区别，再分别为姚紫笔下的女主人翁依据典型与类型找出代表，尝试窥探姚紫在塑造人物的技巧与其如何用如此方法来突出文本女主人翁的个性与文本主题。

在此论文第三章中也将讨论这些女性人物所带来的社会隐喻。姚紫关怀社会的现象都凸显在了文本当中，他对社会有着美好与理想的追求，所以都以揭露的方式将社会的毒瘤曝露在文本中，企图用文学改变社会。可惜的是，姚紫无法在现实与美好中寻求到平衡，这让他陷入了一股追求与放弃的懊恼之中。

最后，笔者将对姚紫是否为黄色作家提出论述，通过简单的释义与定义，提出自身认为姚紫为黄色作家实为误谈的想法。

关键字：姚紫、南来作家、女性人物塑造、现实主义、黄色作家

致谢

我知道许多时候真挚的感谢并不能通过文字来表达，但是此时此刻，我只能将我感恩的心化为文字，向我感谢的他和她，致上我最真诚的谢意。

在撰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在台湾研修的许老师忙碌之余依然严谨地指导学生的论文，对于我所犯下的错误与疏失也给予仔细的指导与包容，谢谢老师在繁忙的时候提供我许多的方向与帮助，大大地减少了我在撰写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瓶颈。

接着我必须感谢我大学生涯那一班自称为“损友”的好朋友们，加馨、惠灵、心洁、智琪、紫晶、子康、向杰，谢谢他们在我遇到低潮与挫折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忽略，相反地，却以宽大的心不断地陪伴与鼓励我，让我在之后的撰写阶段能够带着愉快的心情完成我的作业。这里要特别感谢丽燕，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感谢她毫不吝啬地提供了许多资料，让我修饰论文格式的过程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再者，也要感谢其他的朋友与老师，感谢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才能让我的论文顺利完成。

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加馨一家人表达万二分的谢意。在我南下新加坡寻找资料之际，感谢加馨充当我的向导陪着我走了一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更要感谢加馨的父母，罗愈翔先生与蔡小莉女士，让我留宿之余更热情的款待，让我寻找资料的过程不仅顺利，更留下了深刻与美好的回忆。

不能不说谢谢的还有我的室友，李欣润小姐，论文期间病了一场的我承蒙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能迅速康复，在我陷入低潮的时候，她也是第一个发现并鼓励我的人。感谢这位非常懂得关怀别人的女孩，谢谢她总是适度地提醒我论文进度但又不给予我压力，常常跟我聊天来缓解我的紧张感，让我开心坚强地度过每一个日子。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母无条件地支持我所有的决定，爱我、关心我、鼓励我，用最温柔的话语让我在挫折的时候依然感受到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感谢疼爱我的哥哥，在我缺乏资料的时候，二话不说独自到新加坡去帮我寻找资料，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在我快乐的时候与我分享喜悦。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感谢在我论文撰写过程中帮助我的所有人，因为有你们的协助与鼓励，我的论文才能顺利完成。感谢我的生命因为遇到了很多爱我与我爱的人而美好了起来。谢谢！

绪论

“姚紫所写的小说，结构严谨，善于把握气氛，操纵高潮，兼以新旧文学素养良好，文笔流利，充分表达了他那横溢的才气。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曾任过新闻记者、编辑、海员、商人和中学教师等。他的生活可说是富有传奇性，正同他的小说创作相似，有如情感的野马；在新马作家群众，他是属于多彩的一位。”（马仑，1984：70）

第一节：姚紫与他的故事

姚紫（1920-1982），原名郑梦周，出生于福建泉州，后成为新加坡公民。他的笔名众多，其中包括了：姚紫、黄槐、贺斧、欧阳碧、向阳戈、唐兮、符剑、西门凤、毕三等等。姚紫 1947 年南来新加坡，任职于南洋商报社，担任《文艺行列》、《世纪路》、《绿洲》副刊的主编。1953 年年底，姚紫离开了南洋商报社。姚紫组织了几间出版社如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文艺报副刊》）与天马图书出版社（出版《天马》杂志）和担任几份刊物的主编，如《朝花文艺丛书》、《新风》等。1981 年杪，姚紫也受邀担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务顾问。

姚紫是新加坡著名的作家¹，他的文学创作产量丰富，巅峰时期更是引起了当时社会极大的关注。1948年姚紫于《南洋商报》发表的〈秀子姑娘〉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回应，女主人翁那二重性格的丰富塑造和文本的社会意识，奠定了姚紫在马新现代文学文坛的地位。继〈秀子姑娘〉之后，姚紫陆续发表的作品包括了：〈乌兰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阎王沟〉、〈风波〉、〈半夜灯前十年事〉、《马场女神》、《情感的野马》、《黑夜行》等等。以下为姚紫作品与出版年份：

	作品名称	合集内收录作品	性质	出版年份
1.	《秀子姑娘》		小说	1949年5月
2.	《乌拉山之夜》		小说	1950年3月
3.	《咖啡的诱惑》		小说	1951年5月
4.	《马场女神》		小说	1952年7月
		〈马场女神〉		
		〈夜茫茫〉		
		〈十三年〉		
		〈毒与那个女人〉		
		〈被当酱料的男人〉		

¹1946年至1965年是新马历史发展的一个大时代，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引发了文坛上无数绚丽多姿的写作内容与主题意识。姚紫于1947年抵达新加坡并于此时展开了他的写作生涯。横跨了这个大时代，他在新加坡的土地上经历了太平洋战争、马来亚独立运动与新马分家等政治形态活动，之后也定居新加坡。他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下了他所触所及的社会议题，带出了当时各个阶级的故事，丰富的内容与细腻的笔法，让姚紫成为了新加坡数一数二的代表作家之一。

		<丽丽的秘密>		
5.	《阎王沟》		小说	1953年2月
6.	《风波》		小说	1954年7月
7.	《黑夜行》		杂文	1959年
8.	《带火者》		小说	1955年7月
		<带火者>		
		<窝浪拉里>		
		<小黑子>		
9.	《半夜灯前十年事》		小说	1961年10月
10.	《情感的野马》		散文	1963年
11.	《没有季节的秋天》		小说	1963年10月
12.	《萍水记》		小说	1964年7月
13.	《西楚霸王——项羽》		历史 评论	1965年
14.	《新加坡传奇》		小说	1985年
15.	《木桶鸭》		小说	1987年10月
16.	《杂文，这支部队》		杂文	1987年
17.	《潜龙记》		小说	1988年2月
18.	《九月的风》		散文	1988年
19.	《短长书》		杂文	1988年

20.	《九月的原野》		小说	1988年7月
21.	《夜歌》		新诗 集	1989年
22.	《郑梦周诗词集》		旧诗 词集	1989年

——以上表格资料整理自谢克〈姚紫小说内容提要〉与吴蒙〈郑梦周诗词集·姚紫生平简介〉

姚紫小说体式上勤于探索，他擅写中篇小说早已为文坛所承认，他的传奇小说、风情小说构思新颖脱俗，情节起伏跌宕，节奏张弛相间，时而笼罩着南洋光色浓烈的风情氛围，而将这些不同人物个性的呈现、心理的剖析有机会结合在一起。（黄孟文，2002：116）姚紫是多方面的写手，其精炼的文笔与丰富的内容题材，为马新现代文学文坛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再者，姚紫积极于培养新人的性格为马新文坛留下了一批批强健的生力军，而以他遗产而设的“姚紫文艺基金”更是对新华文学的贡献甚大。

第二节：研究目的

本论文的题目拟定为：“女性的哀歌——论姚紫中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刻画与其社会意义”，笔者之所以着重于姚紫女性人物的塑造是因为在阅读了姚紫大部分的作品之后，不难发现姚紫的作品当中最容易吸引读者视线的即为他

笔下那丰富艳丽的女性人物形象。经过再阅读的过程后，笔者也发现姚紫的每一位女主人翁背后其实都有自身的意涵，那多姿多彩的形象不是为了抓住读者视线而塑造的，相反地，每一个漂亮的身影其实都是姚紫经过深思熟虑的创作过程后才应运而生的。他们有着姚紫对于社会的寄望和自身丰富的情感。以姚紫的中短篇小说为主，本论文尝试从这些女主人翁的角色与性格中带出姚紫潜在故事中的社会隐喻。而以“女性的哀歌”作为题目的开题，是因为在这些女主人翁身上，绝大部分的她们都有自身无法言说的顾虑与哀愁，她们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关爱社会的姚紫，将社会问题透射在她们身上，通过女主人翁的视角或行为态度，唱出对现实社会无尽的哀叹。因此，如何从女主人翁身上看出姚紫想要寄托的社会隐喻，就成了笔者想要研究的主要目的。

“向色情生活方面找题材的作者，最成功的一个是姚紫（黄槐，贺斧）。”（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78：104）

方修对于姚紫如此的评价，更是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姚紫那鲜明的女性人物刻画是否真的与色情或黄色文艺扯上关系？故此，笔者将在余论部分进行讨论，来简单地探讨姚紫的女性人物塑造中是否隐含了黄色成分。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研究难题

由于研究重点从姚紫笔下中短篇小说的女性人物出发，因此，本论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归类与分析出了姚紫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和背后的社会意义。姚紫笔下中短篇小说数量众多，笔者以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姚紫小说

选》内的文本作为主要讨论对象，这本小说集虽未收纳姚紫所有作品，但是协会委员以一套审核标准节选出了姚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了：〈乌拉山之夜〉、〈秀子姑娘〉、〈窝浪拉里〉、〈马场女神〉、〈夜茫茫〉、〈十三年〉、〈毒与那个女人〉、〈被当酱料的男人〉、〈丽丽的秘密〉、〈阎王沟〉与〈半夜灯前十年事〉。

经过了文本细读的过程后，笔者也将以姚紫自身的想法作为辅助，为笔者自身的观点做出逻辑性的结论。因此，笔者多方参考了姚紫的杂文集《杂文，这支部队》与尽量阅读姚紫其他的著作来尝试窥探姚紫真正想要透过作品去体现的想法与目的。由于姚紫的作品多用于表达时代与环境的真实状况，笔者也涉猎了关于马华文学史的资料，尝试通过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论证姚紫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

笔者在研究这份论文之时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姚紫曾经被误读为黄色作家，他的资料在马华文学史上明显比其他作家来得少，作品也并没有收录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等著作当中，所出版的文本大部分也已经绝版。除了《姚紫小说选》中的十一篇文本，在没有复印本的协助之下，笔者只能通用研究作者手稿的方式进行文本细读，在某些程度上对于一些字句的分析失去了一定的准确性。贵为新加坡国宝级作家的姚紫，大部分的资料都储存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而一道海峡的距离，更是成了笔者获取资料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

在将姚紫的文本进行细读与划分之后，笔者将论文分为了四个部分（三章，一个余论）作出讨论。第一章，将上文提及的十一部中短篇小说做出姚紫笔下女性人物的归类，而第二章将以第一章作为基础，先简单地谈论小说人物塑造的方法：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再浅析姚紫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来塑造文本中的女性角色。至于第三章部分，笔者将讨论这些女性人物背后的社会隐喻及姚紫如何透过这些人物来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想法。最后的余论部分，将针对姚紫是否为黄色作家作表达出笔者简单的看法。

第一章：姚紫中短篇小说女主人翁人物归类

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诞生，其不仅影响了中国大陆，更推动了海内外华人的白话文写作热潮。马新现代文学的滥觞也与五四运动有着莫大的关系，方修先生曾经在为马华新文学下定义时提及：“马华新文学，简括来说，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方修，1971： 3）在新马尚未分家之前，马新华文现代文学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丰富的题材与浓厚的南洋色彩让早期的马新文学在现代华文文学的新舞台上描绘出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南来作家是推动早期新马现代文学的一大推手，他们笔下的作品结合了强烈的侨民意识，与当地作家的本土意识起了意识消长的现象。虽然如此现象引起了各家的争论，但是，在这些矛盾的磨合下，却也让马新华文现代文学在发展中显得更为精彩与题材广泛。姚紫是马新现代文坛中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作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小说、杂文、诗歌、散文等，所刊登的作品也引起了当时读者的激烈回响。

姚紫的作品曾经因为对女性进行细腻的叙写而被误划为黄色作家，但其流畅的文笔与鲜明的人物刻画却也为读者们津津乐道。故此，本章节将以姚紫笔下的著名中短篇小说（以新加坡文艺协会之标准为准）：〈乌拉山之夜〉、〈秀子姑娘〉、〈窝浪拉里〉、〈马场女神〉、〈夜茫茫〉、〈十三年〉、〈毒与那个女人〉、〈被

当酱料的男人》、《丽丽的秘密》、《阎王沟》与《半夜灯前十年事》中的女性形象做出简略的介绍与分类，来探析姚紫笔下小说中那亮丽的繁花剪影。

第一节：爱国女性

姚紫对于文章的架构和流向是灵活而具有层次，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仅限于摇旗呐喊宣称自己爱国，相对地，在姚紫笔下的爱国女性个性情感较为鲜明，故事情节也较有张力，他通过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阶级地位，勾勒出笔下女主角的特色。

《乌拉山之夜》是姚紫早期的中篇小说作品（1944年），文中女主人翁亚莎菲是姚紫笔下爱国体现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在姚紫笔下，亚莎菲的情感是坦荡、是炽热的，她不惜背叛自己投靠日军成为蒙奸的父亲，这除了与男主人翁巴克奇的感情故事线之外，也与自身浓厚的爱国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叫亚莎菲，你必须了解我的！我不是蒙奸！”（刘笔农，1999：8）

“爸爸是蒙奸，为什么女儿也要是蒙奸？”（刘笔农，1999：8）

亚莎菲是坚定的，她认定了乌拉山的军士们都是能够并肩保护祖国的英雄，所以她泄露日本军事机密，背叛父亲，选择了自己认为正义的一方，成为了姚紫笔下最鲜明的爱国女英雄。

提及姚紫，就不能不提〈秀子姑娘〉。〈秀子姑娘〉是姚紫笔下最典型的中篇著作，女主人翁秀子的矛盾被姚紫刻画地丝丝入扣。秀子是来自日本的女间谍，与男主人翁姚（我）的感情和对于日本天皇的忠诚造就了秀子内心的冲突。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秀子无疑是爱国的。

“没有什么意思！很简单，我是日本人！”她的态度强硬起来，愈说愈有勇气：“我不能出卖他们！不能出卖祖国！先生，倘使你强迫我，请你给我死吧！”（刘笔农，1999：42）

秀子的爱国精神是不能够被否定的，眼见着战争带来的灾害而对自己心中故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她却依然不愿意背叛自己的祖国。这样的一股将近偏执的倔强虽然将秀子引向了死亡之路，但，秀子的爱国精神是可敬的。

有别于亚莎菲的英姿飒爽和秀子的内敛坚定，〈阎王沟〉中的蒋桂花的爱国体现并没有太过特出。但是，在姚紫的文笔中，我们可以发现，爱国是不分阶级与身份的。蒋桂花来去无踪的身世为她的身份带来了神秘感，但是就算是身为娼妓，她的爱国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姚紫在文章末通过王司机的想法明确地写出了蒋桂花的爱国精神：

“……桂花，和桂花相似的那群女人，都是在战争下遭受牺牲的一群！……一个女人到了日暮穷途的时候，为了活命，只好出卖上帝赋给她们那最原始的工具，她们只让人们侮辱，她们从来没有侮辱别人！”（刘笔农，1999：219）

“认真地说，她们都是祖国坚贞的女儿！她们情愿做娼妓，做乞丐，不愿在敌人的铁蹄下偷生！她们真正地把生命和财产牺牲给祖国，从来没有一丝怨叹！把她们比起今日马来亚那些因为不能拉紧鼻子而怨叹上帝不好的洋化小姐们，她们真要高贵几倍了！”（刘笔农，1999：220）

姚紫运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以澎湃的语气描写了他对于如蒋桂花一般高节的娼妓致敬。“她们都是祖国坚贞的女儿！”她们的爱国精神不仅震撼了书中的主人翁王司机，也感动了文章前那数以千计的读者。

第二节：平凡生活中的女性

姚紫的文风虽然趋于男女生活中的爱恋故事，但是他对于现实生活的刻画也相当生动到位。比起精彩的间谍爱情故事和历史底蕴丰厚的写作走向，姚紫对于平凡生活中也有细腻的观察，他将自己所观所闻之处细心品味，为自己笔下的主人翁表现出另一种生活面貌。若是与其他的文章作为比较，此节中的女性性格刻画显得较为平淡，但就因为这样的平淡，却成功地带出平凡女性真实的样子。

在〈十三年〉中，姚紫对于女主人翁霞的刻画显得较为朴实，驾轻就熟地使用自己擅长的细腻身体描绘，以女性的形象来带出故事背后的沧桑与无奈。

“她穿着黑色的旗袍，益发显出腰肢的纤瘦，瓜子型的脸儿很苍白，眼皮的边角露出细微的皱纹，映在灯光下，像一朵已经开过季限的蔷薇，开始在凋谢了，秋风夹着烟沙荡漾在她那大大的眼睛里……”（刘笔农，1999：137）

姚紫对于女性的描写在〈十三年〉中可说是点到为止，仿佛一切的哀伤都凝聚在了女主人翁那荡漾着风沙的大眼睛里。女主人翁淡淡一句“我们原可以幸福的呀！你说是不是？”（刘笔农，1999：141）带出了相遇而不能相惜的遗憾，也写出了生活中随处可见那生离死别的哀伤。说起生活中随时会发生的生离死别，〈半夜灯前十年事〉也牵涉了这样的主题。战火的肆掠让生命的重量变得更轻，就算是近乎完美的小筠，依然难逃此劫。

“身材长得亭亭，油乌的短发披在耳后，过去那圆圆的面庞瘦长了些，变成鹅蛋型了，只有那双还像秋水般的含着温文，——当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的颊上浮着两朵少女羞涩的绯红；比天边的彩霞还红……”（刘笔农，1999：231）

姚紫对于小筠的刻画是简单而美好的，他以简单清新的形容词带出了男主人翁对于小筠的记忆。越是单纯越美好，小筠简单而内敛的性格，在男主人翁心中留下了不灭的记忆，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整个文本的人物塑造，更是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圆圆的脸，乌大的眼睛，丰腴的体格，平时他最喜欢她那白净的皮肉，依照相书看来，十足是‘贵子相’”（刘笔农，1999：144）

“她穿着一件大朵黄花绿底的新旗袍，抹着胭脂，一股浓香的香水冲入他的鼻孔。样子同晚间的她，仿佛变成两个人。”（刘笔农，1999：149）

那是姚紫在《毒与那个女人》中对于女主人翁，“女人”的描写。有别于强烈的个性，对于平凡女性的描写，姚紫更着重在脸部与身体的写法。在人物性格转变之后，姚紫也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呈现，用了脸部和服装细节的差异，来带出了一个平凡女人的形象刻画。没有激烈的语气，没有激昂的情操，姚紫通过生活中随时会遇到的事情，简单地勾绘出平凡女性的特色，以独特的故事线铺叙，将女主人翁的平凡化为不凡。

第三节：殖民时期女性

东南亚各个地区几乎都被西方列强占领过，这为人们的地区风俗习惯带来了另外一种文化刺激。在姚紫笔下殖民时期的女性，其形象也是多姿多彩的，不管是来自殖民主地区的女性又或是本土女性，各式各样的风貌，都在他的笔下一一上演。

《窝浪拉里》也是姚紫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翁兰娜是来自荷兰的女子。殖民主地区女子的形象在兰娜身上得到饱满的雕塑，

“她睡得很熟，棕色的头发象微波般的流漾在席上；一双雪白的胳膊露出两三道青肿的鞭痕……我惊讶于昨晚那样憔悴、肮脏、乞丐似的女人，竟是那么动人的身段！还有一张美丽的轮廓，弯长的眉毛，尖直的鼻子，薄薄的唇皮；加

入不是消瘦了，面颊苍白，观骨高耸，那是多么理想的一个模特儿啊！”（刘笔农，1999：94）

姚紫细腻地勾勒出西方人与东方人的不同，再用当地人的目光来带出东西方人生理上的差异。在文中，对当地居民（印尼人）来说，兰娜的形象是独特的，

“……这种尊卑的观念，使女人们对现在的兰娜——一个可让她们当面窥探神秘的荷兰人，感到新奇、纳闷，因此，她们喜欢发问：她的鼻子怎么那么尖？她的眼睛为什么是蓝色的？”（刘笔农，1999：111）

就外貌来说，兰娜与当地的居民是不同的，不仅是外貌上的差异，在性格上兰娜与当地居民的性格也有着悬殊的差异。大部分的居民显得朴实而自足，但兰娜却怀念于过去奢华的生活，她对于物质有着强烈的追求以至于最后的翻脸不认人，这些都是姚紫刻意的铺排，而这样的铺叙也饱满了兰娜——这位殖民主地区女孩的角色内容。

被英国统治超过百年的马来亚半岛在生活习俗上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居民的服装和行为举止都逐渐洋化，这独特的南洋情怀也体现在姚紫的小说中。姚紫的书写以中文为主，有时也有福建词语的出现，但在描写这些西化女性出场之时，他也会以一些英文用词来更好地衬托出这些女性的鲜明形象。〈马场女神〉中的神秘女郎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

“我敏感地抬起头。——右角，一双水汪汪的眸子正向着我微晒；那涂均膏红的小口，露出两排石榴般的白粒。黄的 blouse，红的 skirt。她正站在我的旁边。”（刘笔农，1999：116）

“在她的眼波里，我看见一丝 charming 的神意，虽然她是那么大方的，自若的。”（刘笔农，1999：117）

这个时期的女性在情绪表达方面也显得比较奔放，比方说在〈被当做酱料的男人〉一文中，男主人翁欧阳明就是在女主人翁刘玉的设计下，被耍得团团转。

“他痴痴地爱上刘玉小姐已快半年了，她总是淡淡地对待他，那鹅蛋型的脸庞浮着两颗醉人的酒窝；水汪汪的眸子却蒙着一层霜，使欧阳明又爱又局促；有一次欧阳明到她家去，她连一杯茶都没有请他，淡淡地说一声对不住，便出门去了。欧阳明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发誓不再找她。但是，第二个星期日到，欧阳明又讪讪地踏入她的门槛。”（刘笔农，1999：153）

姚紫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向来形象多变，而处于这个环节的女主人翁也显得特别神秘，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刘玉小姐、如梦似幻的马场女神、寡性凉薄的兰娜为殖民时期的女性代表增添了不一样的风采，更好地表达了姚紫对于这个时期社会的观察与想法。

第四节：娼妓与舞女

娼妓在 18-19 世纪中期的东南亚地区可谓相当兴盛。在马新现代文学文坛中，以娼妓和舞女作为题材的创作也多不胜数。娼妓和舞女的形象在作者们的笔法的护航之下，角色大多不再卑微，反而以不同的姿态跳跃于文字之上，推翻了读者对于娼妓与舞女的刻板印象，带给读者更深的思考。

在姚紫的作品中也不乏以娼妓和舞女作为女主人翁背景的小说作品。姚紫在〈阎王沟〉中赋予了蒋桂花正面的形象，虽然身为私娼，但是蒋桂花等人都拥有身为人类的尊严。在男主人翁王司机眼中，蒋桂花并不比任何一个女孩差，甚至比某些只会抱怨不懂得知足的南洋小姐和吝啬的商人好太多了。

“我还记得，桂林有一次献金活动……在那伟大的号召下，娼妓们慷慨地走上台献金，脱下她们的金戒指，捐尽她们的现金，而那些巨商大官们，平时挥毫使阔，结果捐出的数量，只抵得他们一次的度夜资，她和他们比较起来，又要高贵得好几倍呢！”（刘笔农，1999：220）

透过王司机的视角，姚紫凸显出了部分爱国娼妓的高尚形象，与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人类都是平等的，就连蒋桂花她们也该是平等的，“在祖国最苦难的时期中，她们咬着牙根接受祖国的命运，她们同祖国过着同样的命运。”（刘笔农，1999：220）不是因为她们是妓女而活该被羞辱，拥有节气的她们，更值得被尊重。

生活的迫切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为当时代的女性带了烦恼，因为家庭的贫困，许多娼妓与舞女也因应而生，〈毒与那个女人〉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文中的女人为了金钱的欲望，瞒着丈夫当了私娼，当时嘴里的原因却与生活上的柴米油盐脱不了关系。

“我也是想帮忙你，你一个月那么点钱做家费，也要柴，也要米，也要房租，……近来东西又贵，我也知道你哭……没办法，阿英姐才劝我走这条路，……她说，成千成万的人都赚，私空仔又没有出头露面……”（刘笔农，1999：152）

丈夫的哑然让贫穷的悲哀彻底地体现在文本当中。而在〈丽丽的秘密〉中，情况也是一样的。丽丽是新晋的舞女，却背负了一个家庭的负担，失业又跛脚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没有办法不下海为家庭做出牺牲。在一众舞女当中，丽丽是个特例，她不会哗众取宠地吸引别人的视线，只是乖乖地坐在自己的板凳上，等 12 点钟声一响即刻收工回家。由此可见，姚紫落下了线索，塑造了丽丽迫于无奈和被逼向生活低头的伏笔。

娼妓背后的无奈与悲哀有多少人看得到或愿意去理解的？凤姑娘是〈夜茫茫〉的女主人翁，通过她的心情与对车夫阿憨的对话，姚紫将娼妓背后的哀愁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是近来，凤姑娘坐上了他的车子，罕得同她聊天了！很郁闷的样子，脸色浮黄，人也消瘦得多了！听伙伴说是“生意”不好，她又是自由卖给干妈的，

身子不自由，客人上门少了，她干妈常常骂她打她，说她不会招待，以致客人不喜欢来。”（刘笔农，1999：129）

姚紫先从旁人的语气来说明娼妓背后的无奈，再让凤姑娘自己交代自己的苦楚，

“活着跟死了差不多！人家白天出来，晚上睡觉。我要白天睡觉，晚上出来，人家快乐，我们受罪！客人多了要烦恼，身子吃不消，客人少了也要烦恼，连饭都没得吃，吓！”她苦笑着地：“鬼过的日子恐怕要比我们好得多啦……”

（刘笔农，1999：133）

凤姑娘到最后还是死了，带着一肚子的哀愁与身不由己，喝下“拉素水”死了。在光鲜的旗袍和昂贵胭脂的打扮下，大家仿佛都只会被那绚丽的外表所吸引而忘了娼妓的尊严与悲哀。通过凤姑娘，姚紫将娼妓那黑暗的一面呈现于众人面前，也丰富了笔下娼妓们的多重形象。

第二章：姚紫笔下女主人翁的人物塑造

塑造一部叙事性浓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人物的性格与形象扮演了绝然重要的角色，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在与胡菊人的对谈中也如此提到：“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胡菊人，1978：185）每一个人物都是作品中的灵魂，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带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节与想法。

既然人物在小说中所占据的分量举足轻重，那么如何塑造鲜明和让读者们产生共鸣的小说角色就成了作家们必须慎重看待的要素之一。故此，本章节将对人物塑造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并着重讨论于姚紫采用了什么方法来让他的笔下人物跳跃于文本之中，让自己的作品大放光彩。

第一节：人物塑造方法

小说人物是多元的，他们可高调可以低调，可以激昂可以平实。小说中不同的角色与其不一样的性格，为小说带来了精彩之处，有的直接彰显了文本主题，有些则神秘地为故事的转折埋下伏笔。若以人物塑造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较为广泛与粗略的划分，大致可以分化为典型人物和类型人物两类。（赖先德，1990：224）有部分学者将“类型人物”称为“扁平人物”而将“典型人物”称为“圆形人物”，英国评论家 E.M 佛斯特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在针对小说

的七个层面发表演说时，用了颇大的篇幅来谈论小说人物的价值，更清晰地运用多本小说进行论证，将小说人物的塑造方法分为两种：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类型人物（扁平人物）因为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人物的性格同环境关系不大，并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赖先德，1990：225）作者在创造如此人物之时都环绕着一个特性，所以扁平人物的性格是单一的，他们的立场鲜明，一开场、一说话都指向最初的立场，在故事中始终不变。这样的角色不仅容易辨认，更能够让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佛斯特在演讲时也做出详细的诠释：

“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纪被称为“性格人物”，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被创造出来。”（佛斯特，1981：55）

鉴于人物性格的单一性，类型人物偶尔在文本中会显得枯燥，在故事中缺乏层次感，但是作者创造类型人物有他一定的理由与想法。**“对某些纯真的人而言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向往不受时间影响、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做为躲避现实变幻无常的场所，扁平人物于是应运而生。”**（佛斯特，1981：64）虽然性格没有转折，但是在凸显立场与表达自己的理想方面，类型人物坚定的力量对文本的铺叙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别于类型人物的一元性，典型人物（圆形人物）的形象性格显得多元。典型人物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又能反映一定时代某一类人的某些共同性的人物形象。（赖先德，1990：225）高尔基曾经说过，只有将现实中反复的全现象反映在一个现象上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范提摩，1972：

156) 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环境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也可以对环境产生反作用。（童庆炳，1992：222）身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身上的特征性能够引发读者的联想，在这些被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中，读者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似曾相识的影子，进而产生与作者或文本角色的共鸣。

佛斯特也针对了典型人物做出了看法，“一个圆形的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无法令人信服，他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佛斯特，1981，64）读者往往无法从故事一开始就了解角色的个性，而是通过阅读的过程逐渐地发掘隐藏在人物角色中的多样性格与矛盾。在创造故事的过程中，典型人物变化莫测或矛盾冲突的性格，带动了情节迭起，让故事读起来更为引人入胜。

第二节：姚紫笔下类型人物与典型人物女主人翁代表

姚紫是马华文坛于40至50年代杰出的小说家，他笔下女主人翁的性格呈现多种风姿，她们的背景或许重叠，但是性格方面却截然不同：有的英姿飒爽、有的多愁善感、有的尖酸势力，有的简单平实。女主人翁多变的性格在作者刻意地营造之下，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被她们的性格所吸引，进而融入情节与文本产生共鸣。故此，此节将按类型与典型塑造法来分析讨论姚紫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来一窥姚紫如何用这样的塑造手法来打造他笔下女主人翁亮丽地身影。

姚紫著名中篇小说《乌拉山传奇》女主人翁亚莎菲，可说是他作品中类型人物的代表。比起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字数较为宽裕的优势让姚紫更好地为亚莎菲的性格按照故事的脉络做铺排。虽然亚莎菲属于类型人物，但是她的角色却不显得枯燥烦闷。亚莎菲身上有着蒙古女子的飞扬与真率，尚未出场之前，姚紫先通过男主人翁巴克奇的回忆带出了他思念亚莎菲这位奇女子的痛苦：

“在他的胸膛中，亚莎菲的影子，一直如毒蛇分叉的舌尖，粘冰冰地舔舐着他痛苦的情感——那杏圆型的棕色面孔，那英媚的黑溜溜的眸子，那矫健的腰肢……他的心烫热地颤抖着。他又跌落在那记忆的绯暗色的网里。”（刘笔农，1999：3）

到底什么样的女子能够吸引抗日英雄巴克奇的目光与让他如此眷恋？亚莎菲甫出场，她的形象就勾起了读者的眼前一亮：

“一个披着染红的狐皮披肩的，垂着两根发辫的年轻姑娘，手里也挥着一把弓，拍马赶上来。她骑到巴克奇面前，爽快地露出那雪白的皓齿，鼓掌欢呼到：“这一箭射地真好哇！”（刘笔农，1999：5）

姚紫对于亚莎菲的刻画是正义而直爽的，有别于其他女主人翁的内敛，亚莎菲的性格在姚紫的塑造下显得更为真挚动人。亚莎菲正面的性格与她的爱国情操起了呼应，她的直率突出了她爱护国家那义无反顾的决心。

“爸爸是蒙奸，为什么女儿也要是蒙奸？”（刘笔农，1999：8）

“你知道他们不敢吗？他们就计划一路从梅力更召出兵……巴克奇君，我是好意的，你们总要先准备才好！”（刘笔农，1999：13）

“你们可乐着，我爸和大喇嘛倒在鸦片灯下叹气哩！”（刘笔农，1999：15）

“有一天我也会参加你们的队伍。我也憎恨那些人。”（刘笔农，1999：19）

亚莎菲的态度与性格是坚定一致的，就算必须背叛父亲，她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在亚莎菲身上读者不难看到作者寄托在她身上的理想——爱国家、忠于国家的理想。在战争和诸多利益冲突之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亚莎菲般坚定而无悔？乌拉山是抗日分子的乌托邦，那里有着饶勇善战又团结一致的军人，而亚莎菲这样的奇女子，她的坚定，她的活力，是这个理想世界中最具正义也最需要的理想类型人物。

类型人物的性格在故事中通常显得较为简单，他们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坚定地凸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想法或是文本主题。在短篇小说《夜茫茫》中，姚紫通过了风姑娘的角色，突出了娼妓人家背后的悲哀。风姑娘在小说中一字一句含泪的控诉和蹙起的眉头，更是预先揭示了小说的悲剧走向。不似其他小说中娼妓们艳丽的形象，风姑娘是先以背影出现在小说中的，姚紫也没有大量地描写她身上的服饰或姣好的身材来描绘风姑娘的姿色，相对地，他将众人的目光集中在她日渐消沉的脸部描写上：

“望着风姑娘的背影，消逝在铁门里，阿憨用袖子拭一拭额头的汗，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三轮车上……”（刘笔农，1999：126）

“……他不愿再探想下去，然而，心头却浮起她的影子，那乌溜溜的眼睛，瓜子型的脸庞，薄薄的一片红唇。每次她坐上他的车子，那一股浓香的脂粉气息，软洋洋地飘入他的鼻孔……”（刘笔农，1999：126）

“可是近来，凤姑娘坐了他的车子，罕得同他聊天了！很郁闷的样子，脸色浮黄，人也消瘦得多了！听同伴们说是‘生意’不好……”（刘笔农，1999：129）

“凤姑娘缓缓转过头。月光照在她的面上，面色有些苍白，那双弯弯的眉梢，微微促拢着……”（刘笔农，1999：132）

通过凤姑娘日渐消沉的样子和坎坷的命运，姚紫带出了部分娼妓人家身不由己的悲哀。除了在男主人翁阿憨回忆里，凤姑娘在文本中的情绪一直都是带着哀愁的，直到最后的爆发，她才说出了自己对于身世的怨恨与无奈。虽然凤姑娘明白阿憨的一片真心，但是按照故事的脉络，一切都如凤姑娘所说一般，太迟了。凤姑娘患了病，也厌恶自己的人生，所以凤姑娘最后的自杀，读者是能够预测的。姚紫用类型手法将凤姑娘归类为一个厌恶自己的可怜娼妓，因此凤姑娘的性格负面、颜色消沉的形象是毋庸置疑的。在〈夜茫茫〉这篇短篇小说中，姚紫用了一个女人的悲剧，成功地带出了娼妓人家背后的哀伤，也丰富了笔下人物的类型人物的姿态。

比起姚紫所创造的类型人物，他笔下典型人物的姿态与性格更是显得多姿多彩。〈秀子姑娘〉是姚紫作品中的经典人物，秀子的性格思想与内心丰富的矛盾冲突让她一跃成为作者作品中典型人物的最佳代表。在人物塑造上，姚紫以太

平洋战争为舞台，他让女主人翁秀子在这个舞台以单人的姿态跳出了双人的舞步。身为俘虏，秀子出场的形象应景地显得脆弱而无助：

“……当她坐在审讯室中我的案前，那憔悴的美丽的脸庞，像一只狼狈的落水的猫，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刘笔农，1999：40）

“这半个月中，可看的秀子是一天消瘦一天……她如一只哑喑而疲惫的夜莺，在阳光下怯弱地蜷伏着……”（刘笔农，1999：45）

“她一抖，仿佛从噩梦里警觉，抬起头，失措的眼神望着我，缓缓地站起身，那浮肿的眼圈泡着盈盈的泪水，忧郁地在长长的睫毛下闪亮着……”（刘笔农，1999：46）

身处敌营的秀子虽然有着娇弱的形象但是脾气却显得得顽固执着，一如绝大部分二战时期日本军士对于国家的忠诚，秀子身为战讯情报人员，她对于日本天皇也有近乎偏执的尊崇。

“‘没有什么意思！很简单！我是日本人！’她的态度强硬起来，越说越有勇气：‘我不能出卖他们！不能出卖祖国！先生，倘若你强迫我，请你给我死吧！’”（刘笔农，1999：42）

“她毫不理睬，只管扑掉自己身上的泥土，挺挺胸脯，嘴里哼着《君之代》的日本国歌，两颗眼睛兴奋地望向天空，她的神气正如久离故乡的游子忽然逢到亲人，不顾一切地流露着心中的欣悦和激动的表情……”（刘笔农，1999：50）

秀子的身上有着对日本的忠诚和骄傲，但是她的内心却住着一位温柔的日本女人。对外，她强悍的性格符合了一个拥有节气的战败者该有的形象，在敌军面前的她显得固执与抵抗，但对内，她有着思念家人、渴望爱情与平凡生活的另一种面貌。眼见战争带来生灵涂炭，秀子起了恻隐之心，但对天皇的执念与害怕波及家人的顾虑让秀子始终无法选择背叛，而男主人翁姚的有意接近触动了秀子的爱情，种种外在与内在的冲击让秀子的性格充满了冲突与多变，她时而高傲，时而脆弱，这样的双重性格不仅让姚紫成功刻画秀子角色中的张力，故事的起落也随着秀子的性格而高潮迭起，让秀子成为读者眼中津津乐道的杰出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的性格是多变而无常的，亦如《窝浪拉里》中的女主人翁兰娜一样，姚紫巧妙地安排兰娜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象的出场，带出了兰娜多变的性格，也让读者跟着兰娜的转变感受故事情节所带来的冲击。《窝浪拉里》以倒叙的手法开展，兰娜对男主人翁的无视和辱骂，不仅让男主人翁呆愣，也掀起了读者的好奇，这对男女之间在还没有相逢之前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兰娜的性格复杂，在姚紫细腻的描写下，读者可以从她的身上见到美与丑的拉锯战。她是一位荷兰军官的女儿，她有着让她值得夸耀的过去，但也有被日本人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时光。兰娜的性格高傲又低贱，温柔又跋扈，是具有双重人格的典型人物。在姚紫笔下，这位来自荷兰的少女是多么地漂亮、多么地与众不同：

“棕色的头发，湛蓝的眸子，一双白玉般的手臂撑在特等观台的栏杆上；那抹着红唇的口红嫣然一展，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粲齿……”（刘笔农，1999：89）

不管是在棉兰的初相遇还是在新加坡的再相逢，兰娜的出现除了一开始因逃亡而变得蓬头垢面以外，其他时候都是漂亮的。然而，如此漂亮的女孩，却有着不符合自己漂亮脸蛋那虚荣低下的人格，她缅怀于过去的时光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可以为了唇膏和香水而出卖自己的身体，也能够落难时对别人卑躬屈膝，胜利时忘恩负义。对她来说，眼前那些施予她援助的人们都是她的救命草，在做错事时选择卑微地道歉，但是在生活回到安逸时，她却能够决然否定他们曾经帮助过她的事实。

“你们的中国真伟大，尤其是你们的民族精神！”（刘笔农，1999：108）

“我不认识你，滚开！可恶的中国人！”（刘笔农，1999：89）

在棉兰的时期，兰娜备受男主人翁窝浪拉里的照顾，甚至与窝浪拉里有着感情的羁绊，但二战结束后，日本人从东南亚撤退，殖民者再次回到了统治阶级之时，兰娜恢复了自己的真面目，站在两位荷兰绅士旁的她显得高傲而不可侵犯，全然忘了自己在落魄时期与窝浪拉里的感情和曾经备受照顾的恩惠。兰娜，这位复杂的殖民统治者小姐，她的性格随着环境而转变，她的多变让姚紫塑造出一个独特的角色，更让姚紫以兰娜的性格揭示了他对殖民者的想法，引发了读者对于历史的深思。

姚紫笔下的典型人物类型众多，在短篇小说中也能常常看到这类人物的产生。姚紫善于用故事情节和人物背景来揭示当时社会所发生的议题，所以《马场女神》中的神秘女郎和《毒与那个女人》中的女主人翁“女人”等人物也跟着应运而生。《马场女神》中的那位漂亮女人的神秘感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似幻似真的相遇让读者都好奇于女人神秘的力量，在读者们与男主人翁一起期待与马场女神的下一次相遇时，却被现实残酷地浇了一盆凉水，这位女神无论多么漂亮神奇，都是跟在富有男人身边的附属品，这是作者留给读者最真实的答案。而在《毒与那个女人》中，贫穷带给一个家庭多少冲击都能从女主人翁女人的身上去寻获。女人来自环境不错的人家，与男主人翁洪永昌结婚几年也显得恩爱，但是生活中的贫困却让女人最后成为了私空仔（私娼），要不是自己被传染上梅毒，洪永昌可能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是个人对于金钱的私欲还是生活中的迫于无奈？姚紫把答案都刻画在女人的性格上，让读者通过女人性格上的转变来自己一一诠释。

无论是类型人物还是典型人物，姚紫都善于使用人物的个性来突出自己的创作主题。他使用了类型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寄予自己的理想，再运用环境背景与典型人物多变的性格来丰富自己笔下小说的众多角色。在细致笔法的叙写下，姚紫将类型人物和典型人物在自己的文本中相互运用而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更引发了他们与作者还有文本之间的共鸣。

第三章：人物形象的社会隐喻与姚紫情感的寄托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动，马来亚也因为日本军队于 1942 年挥军侵略位属于东南亚的这片土地而有了重大的改变，超过百年的殖民地统治系统在这个时期受到重创，人民的社会体系与思想观念也因为战争的爆发和生活环境的动荡而起了巨大的转变。文学艺术是精神生活的重要一环，当然也随客观形势的变动而有所波动。（苗秀主编，1972：1）于二战时期前后活跃于写作的姚紫，其作品正因为跨越了这一大转变期而呈多样化，他细腻的写作手法不仅丰富了笔下主人翁的性格，文本内容主题更是凸显出了当时社会的面貌与动态。

艺术源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于艺术作品，姚紫有自己所坚持的一番见解，他在〈文艺与科学〉这篇随笔中提到，“文艺所表现的，是人类社会的活动状况，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姚紫，1987：5）在姚紫的概念中，文艺所表现的与人类自身的活动是息息相关的，而好的文艺则应该是能够凸显生活之余又受到大家欢迎的作品。他在〈什么是好的文艺〉中也引用了一位“巨人”的话（文章中未点出身份）：“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者，为大众的动机与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姚紫，1987：10）由此可见，姚紫追求的文艺并不是一味追求“美”的文艺，也不是抽象的文艺，在姚紫的观点中，前者只是随意摆弄并消遣文字，而后者则忽视了人们对于生活上的需求。

紧扣着用艺术表现生活的创作意识，姚紫在他的作品中真实地流露出了对生活的关怀意识：对于国家的情操，对于祖国的回望，对于殖民者的批判，对于

时下社会的哀叹，种种的思想与感触都跃然于他的纸上。横跨了二战前后期的
一大界线，姚紫的文学创作显得多姿多彩，他更为这段过渡期中不同的人物思
想筑造出不一样的故事和背景，在男女主人翁爱恨交错的感情故事中，他将主
题意识、生活面貌甚至是作者个人的情感，悄悄地铺叙在故事的脉络中，让读
者们细细地品味个中滋味，并看出作者想要通过文本所反射出社会最真实的那
一面。

第一节：女性人物所体现的社会隐喻

对于写实主义的作家来说，文本环境往往是生活最好的投射，那里可以是寄
托自己理想的乌托邦，也能是讽刺暗喻现实的理想之地。在姚紫的作品当中，
比起女主人翁丰富的形象与鲜明的性格，男主人翁在他笔下的刻画显得较为欠
缺，而且大部分都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作为出发点。虽然在人物形象方面
不如女主人翁来得精彩，但是男主人翁的思想却充斥了整份作品，很多时候，
他更是作者融入自身情感最好的对象。姚紫先用女性鲜明的形象与性格抓住读
者的视线，再以男主人翁的角度带出看法作为辅助，在男女主人翁相辅相成的
绝佳配合下，带出了他想要表达的社会关怀。

（一）战争背后的哀伤：向往和平与自由的灵魂

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火笼罩着各地之时，姚紫正值青年。亲身经历战争的这段
时期影响了姚紫的一生，它不仅牵动了姚紫心中那把爱国的火焰，更让姚紫的
抗战文学作品描绘地更为传神与细致。在姚紫的抗战文艺作品如〈秀子姑娘〉、

〈阎王沟〉、〈乌拉山之夜〉等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在高喊着爱国精神的主题创作之余，姚紫其实也写出了战乱中一群渴望着自由与和平的小人物心声。

一、〈阎王沟〉：蒋桂花

在战火纷乱的大时代中，蒋桂花是平凡的。因为战乱的波及成为私娼，依靠着男人只为生存和寻求生活上的避风港，流离失所而被迫漂流他乡，女性在战乱中的无奈与悲哀都通过〈阎王沟〉的蒋桂花一一得到凸显。在战争的破坏下，无依无靠的人更显得势力单薄，二战时期的中国黑暗的政治，官商勾结和其中牵扯了利害关系的勾当，让普通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人们，尤其是女人们都希望遇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和可以安身的地方。像绝大部分战乱时代中的妇女一样，蒋桂花虽然有着爱国的情操，但是依然怕死、怕刑、怕苦，毫无靠山的她是在战乱中最典型的平凡女子。

在这个时候，王司机（文本中的“我”）以救赎者的形象拯救了蒋桂花的性命，免去了她被诬赖为汉奸的罪名更将她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在整个局势上来说，王司机不过只是马来亚华侨机工的一员，在政治的海洋中根本沾不上边。但对于蒋桂花，能够动用到与上层的一点关系而解救自己于水火的王司机仿佛有着无尚的能力一般，因此，才引发了蒋桂花想要依赖的心情，

“她哽咽地：‘王司机，我太苦命了……如果有人肯收留我，我情愿做鸡做狗……’”（刘笔农，1999：199）

“我黯然默着。——我了解她的意思，可是我从没想要她‘从良’的！何况在这战乱的时期，自己的命运也像枪膛里的子弹，不知几时放射，哪能替她想得远长……”（刘笔农，1999：199）

王司机终究没有带走蒋桂花，因为在动荡的局势中，他也茫然而不知所措，除了扮演好自己南桥机工的角色，他的生活也如蒋桂花般那么漂泊不定。王司机在〈阎王沟〉中也不是大英雄，除了在文本前部分动用关系拯救了蒋桂花以外，他也没有其他英雄的体现。他是普通的南桥机工，也会有私欲，所以与他那一小队的同伴连成一线，在通货膨胀的时候透过旁门左道来中饱私囊，

“于是，我们这一队的家伙，除执行任务，运军队，输粮食，载军火……之外，也学起‘黄鱼车’的作风，挟带货品、走私，出卖汽油，或者在空车回驶的半途，偷收搭客，赚了的钱都是二一添作五……”（刘笔农，1999：166）

姚紫无意塑造王司机的英雄角色，因为王司机终究只是平凡的一个，所以在死亡的逼近之下，他也只能选择仓皇而逃。再次与蒋桂花相遇是他所料未及的，为了逃避蒋桂花丈夫的恶意谋害，原本打算带着蒋桂花逃走的王司机最后还是选择独自逃难，再次地丢下蒋桂花。

“人的价值是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的！当时代的暴风来了，人的生命都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浮的未必可贵，沉的未必可耻；英雄与弱者之间只隔着一层包纸，拆掉那层纸，都是赤条条的一个人！”（刘笔农，1999：219）

人的价值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在战争面前，又更显得卑微。蒋桂花最后又跟着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离开了，而王司机也回到了南洋。平凡的蒋桂花，平凡的王司机，他们是在大时代中被遗忘的人们，但是竭尽自己的本分生活，他们爱国，所以可以为祖国的抗战事业献上一份绵力，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他们更渴求平静，在所有纷纷扰扰之中，他们只是一群追求和平生活的微小人物。

二、〈秀子姑娘〉：秀子

“创作是内心受了压迫、激动、而要求发泄的一种表现。”（姚紫，1987：86）姚紫在〈“秀子姑娘”后记〉中引用了高尔基的话来表达自己创作〈秀子姑娘〉一文的感叹。眼见着八年抗战所带来的生灵涂炭，中国人民饱受侮辱，姚紫将自身的悲愤融入了故事当中。〈秀子姑娘〉的故事架构是独特的，在男女主人翁的悲剧爱情故事中，姚紫通过了两个不同环境背景的人，写出了他对于战争的厌恶与渴求自由和平的精神。他在〈“秀子姑娘”后记〉中也如此提到：“我们原应该明白，人类需要的是什么，人类不需要的又是什么？”（姚紫，1987：87）在抗战文艺作品引领趋势的时候，他探讨的不是两个国家兵戎相见的课题，而是凸显出了在战争下，所有人都显得平等，他们都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他们想要的只是没有战争、没有武力的平静生活的社会课题。

秀子是日本人，她的民族精神在她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在二战时期的抗战文艺中，大部分作者在处理侵略者这类型的人物时几乎不留情面，往往采取批判的写作方式，但姚紫在叙写秀子的人物性格时有着自己的想法。秀子固执但又显得娇弱，也因为尽忠而变得矛盾，她的二重性格是两种极端的冲击，明显

的对立更容易引发读者们对秀子的性格产生反思。她尽忠着自己的日本天皇，所以就算深爱着男主人翁姚，也不坚决不将日本的军事机密透露，这是秀子对国家尽忠的一种坚持。但是，秀子却也是个渴望和平的女人，在刚毅固执的背后，她有着传统日本女子的柔情，她思念着她的家园，思念着她的故土：

“‘在海的怀里，当你看见惊涛骇浪，你会觉得自我的渺小，当你看见那万顷烟波，海天相连……’她沉在往事的思维中，像梦呓一般地低低自言自语：

‘我在祖国的时候，喜欢独自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沙滩上，倾听海的声音……然而已经一年，一年不见海了！’她情感激动地，凄然住口。”（刘笔农，1999：61）

“‘先生，为什么我们要战争？没有战争，人类就活不下去吗？’”（刘笔农，1999：62）

“‘别说了！别说了！’她凄然地：‘先生，你不知道的！一年前我是连一只小鸟都不忍心踏死的……’”（刘笔农，1999：63）

秀子本是一个温柔而爱好宁静的女子，但是战争扭转了她的思维也强硬地改变了她的性格。日军的强势作风让秀子变得激进与固执，但是秀子的不叛变却不是因为她真正地支持战争，她虽然爱国，但是她讨厌战争，更害怕背叛了祖国之后，家人更会因此而受到牵连：

“……我的一家都在东京，政府对待投降敌人的皇军，多么毒辣，一人漏出消息，全家都得死，我临走的时候，爸爸流着泪告诉我，万一遇到不幸，自杀吧！上可对天皇陛下，下可安慰父亲兄弟，别拖累……”（刘笔农，1999：57）

家人的安危让秀子框住了她自由的思维方向，她的想法与做为也因此而不能随着自己的所见所及而擅自改变。而男主人翁姚的出现，更是让秀子的内心起了激烈的矛盾。姚在文本中以正义使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动机，他的语气字字句句都表现出了他对于战争的厌恶和追求平静生活的理念：

“秀子姑娘，我与你素来没有仇恨，如果有强调我们对立的，那是残酷的战争……你怎么不想想，中国人民遭受到了甚么命运？你们是人，中国人就不是人了吗？为什么只许你们生存，不许别人生存呢？”（刘笔农，1999：47）

“我并不尽忠于蒋介石个人，我是尽忠于人类的正义！”（刘笔农，1999：48）

姚的立场比秀子坚定，他虽然对秀子动了心，但在个人情义与国家的苦难中，他依然选择了后者。在男军士眼中，家国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个人的情感，所以他利用了秀子的爱情，从秀子口中套出了话，尽管内心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感到抱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姚并没有感到后悔，

“我唏嘘的。我想说：‘原谅我吧！秀子，虽然我也爱你，然而我是反侵略阵线上的一个战斗员，在人类尚未获得和平的时候，我必须忠于我的任务，如同你爱你的祖国！’”（刘笔农，1999：73）

秀子最后在与姚的争斗中被姚误杀了，姚感到了深切的悲痛，因为他是多么地爱着这位矛盾的异国姑娘，他请求秀子的原谅，因为他知道灌醉秀子而得到情报，是出卖两人爱情的罪孽行为，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为了社会的和平，姚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背叛个人情感的路。

对于如何铺排秀子的结局，姚紫一开始也是感到困惑的。秀子的国家意识和个人情感的矛盾冲击让姚紫也难以下笔，可是到了最后，姚紫依然制造了一个悲剧给秀子。“这故事仍然在今日的人类社会中血淋淋地进行着，多少矛盾，多少仇恨，多少流泪的爱，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的时候，多少异族异国的男女在歧途上彷徨着，秀子是要死的。”（姚紫，1987：87）姚紫在后记中为秀子的结局做了一个沉痛的总结。如同秀子的悲剧一般，在战争下的生活，许许多多的失去与错过就如同秀子的死去般如此让人遗憾，而现实中也有许多束缚着自己内心自由的问题。通过〈秀子姑娘〉一文，姚紫不仅带出了强烈的爱国意识，更将人们所追求的和平与自由通过秀子与姚两位来自不同国界的角色带出，所有的人都渴望自由的灵魂，我方追求，他方亦然。

（二）殖民时期的扭曲：背叛与抛弃的镜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马来亚的土地上，这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苦日子终于过去。奈何，人们的好消息却未能维持太久。9月5日，英国殖民主义者打着“向日军受降”、“维持秩序”的旗号，以25万兵力开进新马地区，接替日军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黄孟文，2002：80）经历了二战再进入殖民时期，人们的思想早已与当初迥然，不甘受辱和意欲争取自由的精

神在马来亚的土地上蔓延，掀起了一股反殖民的思想，而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主题意识，更成为了 1945 年至 1948 年期间马华文学走向的大势。

姚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善于用文本表达自己的看法，继〈秀子姑娘〉这篇杰出抗战文艺后，他再次发表了〈窝浪拉里〉。〈窝浪拉里〉与其说是一篇爱情小说，毋宁说是一篇社会政治小说，一篇反殖民的小说，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象征的兰娜的形象。（杜丽秋，1999：326）〈窝浪拉里〉中的兰娜，是姚紫笔下典型代表，更是在一众反殖民文艺中杰出的殖民者形象代表。这次，挥别了二战的硝烟，姚紫将笔锋转向了殖民者，文本中浓厚的反殖民意识，将殖民者的丑态暴露，更揭示了现实生活中被殖民的悲哀。

在〈窝浪拉里〉中，兰娜也一样具有双重性格。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美与丑的对立。在外表上，兰娜无疑是美丽的。棕色的头发、湛蓝的眼眸，兰娜的美丽来自她出色的外表，那与众不同的漂亮脸蛋与身材。她的美丽引起了当地妇女们的讨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兰娜与平凡的他们不一样，人们对她美丽的评价正如同殖民者在人们心中那高高在上的形象一般，让人觉得好奇而又自愧不如。

“他们把兰娜看作一个比一般人不同的女人，至少是高贵了一等！——在那朦胧的脑子里，还保存着受统治时期的印象，当他们经过荷兰人的面前，男的女的都必须战战兢兢地俯着头，连瞧都不敢瞧的；偶然赶着牛车经过荷兰人的府第，也要下车不行走过去……”（刘笔农，1999：111）

经过殖民者统治多年，许多人民对于殖民者领袖的余威依然感到恐惧，就算殖民政府已经受到日军的打击甚至已经将他们抛弃，但是在他们心中，殖民者的角色依然高出自己一等。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殖民者威迫的形象已经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就算换了统治权，这样的现象依然难以消除。

艳丽的外表和凹凸有致的身段让兰娜看起来既特出又漂亮，但是，兰娜的丑陋却是发自内心的，她内心的贪婪与欲望都通过她的行动来表明，她无法忘怀她光鲜亮丽的过去，在贫困时期对于追求的美好的欲望更是显得丑陋，她的价值观低廉，是可以金钱或美丽的物品来衡量的。为了一支唇膏，为了一瓶香水，兰娜可以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只为了那刹那的美丽与虚荣。

“我恍然大悟——她是因为得到一支唇膏而快乐着！这种从极微小的物质中得到快乐，天真得像小孩子炫耀他的玩具……”（刘笔农，1999：101）

工业革命的展开让列强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和获取天然资源而发动了侵略行动，天然资源丰足的东南亚地区更是成为了他们觊觎的对象。他们占领着这片土地，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不是为了当地的百姓，而只是霸道地夺取殖民区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富足。他们物欲的心态与兰娜那无穷无尽的欲望是相似的，他们对于资源的贪婪就如同兰娜对于胭脂水粉的追求一样，皆是通过自身低劣的手段来获得并占有的。

文本中的兰娜代表了殖民者的化身，她在文本中的经历与殖民者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的姿态几乎相同。在日军攻入东南亚之前，殖民者占领了殖民区珍贵的

资源，恣意挥洒他们从殖民区夺来的荣华富贵；沦陷之后，殖民者几度受挫，后来更离开了东南亚的土地；日军投降后，殖民者们再次地回到了这片土地，想要以高姿态继续夺回他们的政权与富贵。而在文本中的兰娜，又何其不是那样呢？在日军攻打印尼之际，兰娜等女子都被日军欺凌至不成人形；在被居民搭救后虚以委蛇的依附着他们生活，被日军带走后消失无踪；而在日军投降后，再次地以尊贵的样子出现在男主人翁窝浪拉里面前并翻脸不认人，这与殖民者的态度又有什么区别呢？

男主人翁叫做窝浪拉里，所谓的窝浪拉里，即为 *Orang Lari*（逃跑者），他从中国逃难到了棉兰，看尽了战争和殖民者的嘴脸，这位天真的男人代表了殖民地区天真的老百姓，他相信兰娜是爱他的，亦如老百姓们相信殖民者会善待他们一般。姚紫通过窝浪拉里的视角，带出了殖民者即虚伪又忘恩负义的一面。他救了兰娜，善待兰娜，愿意为了兰娜而去满足她的欲望；他给兰娜说故事，说来自中国的故事，也愿意相信兰娜的爱情，认为兰娜会知错悔改，在获得和平之后与他结婚。

“半响，兰娜又幽幽地说：‘亲爱的，假如我们能够活到战争结束，你愿意跟我结婚吗？——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吧！我的生命是你的一根肋骨，象亚当与夏娃那样！’”（刘笔农，1999：109）

“我太高兴了！在我的心中，你永远是我的公主，宝贝儿和童话中的仙子。”
（刘笔农，1999：109）

兰娜给了窝浪拉里一个梦，一个会在一起长相厮守的梦。但是兰娜被日本人带走之后就不见了！这对窝浪拉里来说一个深刻的打击，对于平凡的殖民地百姓来说，更是一个绝然的冲击。殖民者在殖民地一直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但是在日军攻打东南亚之际，他们并没有保护他们，而是在受了几场败仗之后，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版图与利益，而任由东南亚沦陷。

兰娜不见了，殖民者也不见了，但是在七八年抗战过后，日军无条件投降，殖民者再次出现在东南亚的土地上。身处于新加坡的窝浪拉里再次见到了兰娜，兰娜一句，“我不认识你，滚开！可厌的中国人！”错愕和伤害了窝浪拉里，更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人们纷纷拥向路的两旁看热闹去了，在我们这辈子中，我们将骄傲地告诉下一代人，我们曾经躬逢那历史上的伟大节日，看过大英帝国的海外臣民，怎样以忠诚和热情来庆祝这个加冕的纪念日子……”（刘笔农，1999：114）

故事的最后，窝浪拉里看着大队经过，留下了眼泪，“不要嘲笑我呀！我的确不是流泪，不是为着兰娜而流着的呵！”（刘笔农，1999：114）他的眼泪不是为了兰娜而流，而是为了土地再次地落入了列强的手里而流泪。看过了殖民者虚伪和忘恩负义那丑陋的一面，家国将再次被他人占领，窝浪拉里的那一滴泪自然不是为了纪念虚假爱情的逝去，而是为了殖民地千千万万的百姓未来的生活所留下的一滴清泪。

（三）战后理想的崩坏：贫富悬殊的悲哀

战争后的社会并不如抗战时期百姓憧憬般美好，在复苏期间，战争所带来的弊病依然充斥着整个社会。病态的社会将马华文学的主题意识带到了另一个走向。岳潜在〈马华文艺的主题〉中针对战后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意志薄弱的人，生活难于维持，迫得铤而走险，因此抢劫，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道德观念沦丧，社会治安不靖。在这里，我们可以写出商人们的苦闷，薪金阶级的烦恼，劳动节生活的艰苦，黑暗社会的动态。”（岳潜，1972：40）

由此可见，战争后马来亚的社会存在了许多值得讨论的社会课题，物价上涨，税务增加，经济严重不景气，许多社会问题都因为生活的贫瘠应运而生。作为写实主义作家，姚紫自然不会错过如此题材。他笔下男女主人翁的爱恨纠缠，都环绕在现实的世界中打转，他写的不仅是故事，还是生活。姚紫对于现实生活的揭示大多体现在了他的短篇小说之中，如〈马场女神〉、〈丽丽的秘密〉、〈毒与那个女人〉等，他同情于社会如此的现象，但是却无法给他们一个美丽的结局，

“我可怜他们，同情他们，还是不能替他们找一条出路。因为那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我笔尖接触到现实问题时，我就胆小又笨拙地逃跑了。”（姚紫，1987：81）

社会问题何其多，但终究缠绕在贫富悬殊的现象里。通过笔下多篇小说，不难看出姚紫对于这些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对于现实生活所感悟的悲哀与无奈。

一、金钱物欲的追求：女人、马场女神

现实中的苦难推动了对金钱的欲望，人在贫困的时候会因为欲望而丢失了自己的道德与人格，所以掠夺案、抢劫等等社会问题也因此而滋生。在〈毒与那个女人〉中，文本中的女主人翁，女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她本有个幸福的家，有个尽责的丈夫和一个乖巧的女儿，可是为了金钱上的欲望，她与丈夫洪永昌多番争吵，让她的丈夫也感到非常疲惫与无奈。

“我……”她哭道：“我也是想帮你，你一个月那点钱做家费，也要柴，也要米，也要房租，……近来东西又贵，我也知道你苦……没办法，阿英姐才劝我走这条路，……她说，成千成万的人都赚，私空仔又没出头露面……”（刘笔农，1999：152）

在被丈夫戳破之后，她没有认错反而为自己的私欲拿出口口。一句“成千成万的人都赚，私空仔又没有出头露面”更是揭露了战后新加坡的社会问题，在金钱挂帅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偏差，金钱和富裕的欲望更是驾驭了很多人的行为，让战后的社会道德产生了负面的生长。

男主人翁洪永昌是个典型的平凡小老百姓，没有丰厚的家底，没有远大的目标，一辈子只是任劳任怨的工作，恪尽职守地做好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但他操

劳了半生依旧无法看到生活的希望。妻子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他保守的生活规划：他该责怪妻子的无耻还是责怪生活的苦难？在洪永昌陷入痛苦的矛盾之际，女儿一句“妈，我饿了”让他瞬间清醒，是钱啊！若不是没有钱，他的生活又怎会如此呢？生活中的无奈是没有结局的，就算揭穿了妻子，生活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在现实社会中，贫穷给人带来的麻烦与困扰是无尽的，那是一个绵绵不断的故事，就如同洪永昌和女人那没有结局的故事一样。

比起〈毒与那个女人〉直接的写作手法，〈马场女神〉的铺叙手法显得较为特别。男主人翁，我，在马场巧遇的那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如此神秘？在充满不安变数的生活中，生命仿佛就像一场赌局，男主人翁赌的是一场马，让他可以换取生活上的安逸；女主人翁马场女神，赌的是一场生活，她在进行着一场遴选男人作为自己手中王牌的赌局。

“她把一个指头在嘴唇按一按，望我示意‘别做声’似的，——那只手指上正闪亮着一只大钻石戒指。接着，她掉过头，很自然地把那个手挂在那男人的肩膀，向门外走去……”（刘笔农，1999：125）

她赌赢了，赢走了一个富豪，一个钻戒，或许还有一段富裕的人生，但是这场赌局何时结束？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进行着这样的赌局？富裕的生活仿佛变成了生活中最高等的追求，而所有的感情与真情在金钱前显得卑微，金钱仿佛变成了统领人们生活的最高将领，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不会引起众人的无限唏嘘呢？

二、贫富差异的缩影：刘玉、丽丽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向来分为几个阶级。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在上流社会显得滑稽，他们跟上层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更多时候是被嗤之以鼻的对象，〈被当酱料的男人〉中的欧阳明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女主人翁刘玉这位上流社会的小姐明显就把欧阳明这类追求者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对象，忽冷忽热的态度来自于他们对于比他们下层人士的鄙视和看轻。欧阳明对刘玉的美好有着偏执的追求，仿佛就像是下层阶级对于上层阶级的追求一般，所以与刘玉走在一起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虚荣，多希望熟人能够看到终于走在他身边的刘玉，让他也能炫耀一下。奈何他终究还是被刘玉玩弄在股掌间的玩具，他只是刘玉想要引发未婚夫妒忌的对象。

“刘小姐正扶着那被打的男人，把那人抱在怀里，边用那雪白的手巾替她拭鼻血，边流泪问：‘Darling! 还打伤哪里吗？哟，痛吗？别生气，那个家伙真是 Fool——Block-head!……’”（刘笔农，1999：158）

当事情超出了刘玉的控制，欧阳明随即被刘玉抛下，就像一个廉价的工具一样。他们在他们的世界显得滑稽又无知，就连酒店的侍者都也不把欧阳明当一回事，在一道道精致的菜肴中，他仿佛就像酱料一样。酱料在用餐时候总是充当了提味、配角的角色，在味道丰富的主食出现时，酱料随即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对象。在刘玉的生活中，欧阳明就担当了酱料的角色，他是 Fool，是 Block-head。欧阳明与刘玉的差别，就像上层与下层社会的差别一样，那无法跨越的鸿沟，是将社会阶层隔开的界线。

姚紫在创造女主人翁的角色时向来有自己的一套作风，虽然不是首开先河，但是娼妓和舞女的角色在姚紫的笔下多半都有自己无法挣脱的悲哀。她们生活中的无奈是社会的产物，以〈丽丽的故事〉中女主人翁丽丽为例，这系列的女性人物都是因为穷困而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弱者。姚紫对于他们的描写是平淡的，没有大起大落故事情节，就好像现实中你我他都会发生的故事一般，简单却又真实。

通过〈丽丽的故事〉一文中，姚紫将贫富悬殊的现实带了出来。若是以丽丽的角色作为一个中间点，那个追求丽丽的男主人翁，我，即是富有的代表，而丽丽那最后才出场并引发了故事爆点的丈夫，即是贫穷的代表。在贫与富的冲突下，丽丽凸显了两个价值，

“丽丽！我并不贪婪，全世界的金银财宝，同你一比，就像尘土一样的卑微，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比做了新加坡的市长，还要感觉光荣……”（刘笔农，1999： 161）

丽丽是男主人翁不惜豪掷千金也要追求的对象，看起来是如此珍贵，可是，她却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因为受伤被裁退，家里的负担落在自己身上才迫不得已而当了舞女的平凡女子。不同的价值观在丽丽的身上得到体现，富有的人可以将金钱视为粪土，恣意挥霍只为博得女人一笑；贫困的人却必须因为家庭的负担而选择让自己的妻子下海赚钱。丽丽的故事不仅突出了贫富的差别，更让社会的阶层通过丽丽的追求者和丈夫的角色中凸现出来。

“他！——杨忠明！五个月前还在爸爸的工厂里做工程师，被机器碾断了一条腿，曾到我家要求抚恤金，爸爸不给他，两人吵闹起来，就被我们把他轰了出去……”（刘笔农，1999：164）

上层社会的人可以随意将金钱花费在玩乐上，但是却不愿意给受伤的员工适度的抚恤金，底层的人除了默默接受以外全然没有办法，所以〈丽丽的秘密〉故事结尾峰回路转，除了是姚紫别具意义的铺叙，更是现实生活中残酷的现象。

第二节：姚紫自身的情感寄托与思想

艾布拉姆斯曾经提过，文学理应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这四个要素成就了创作，更成就了一个阅读的过程。作为文学四要素的其中一个部分，作者的角色是重要的。由于西方主义浪漫派的兴起，人们认识到文学活动不仅仅是对世界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作者也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他的感受和感情，并试图以此唤起读者相应的感受和感情，因此，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作者的感情表现活动。（童庆炳，1992：36）姚紫是个多方面的写手，创作产量颇丰，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他又有意识与无意识地透漏了些什么情感呢？

一、关爱回望祖国：理想中的美好影子

马华文坛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经掀起了一股“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本土性与中国性内容受到了作家们激烈的争议。身为中国南来作家，姚紫有着一股

傲气，他诚实面对中国鸦片战争后所带来的社会败坏，秉直地写出当时代政治的腐败黑暗，但是对于故土，他始终有着一股美好的寄托，在〈逃难作家〉这篇杂文中，姚紫甚至用着反讽的语气调侃那些忘记自己祖国的作家。

“不错！像这样的作家，逃难到马来亚来，岂有资格登上‘马华文坛’！而那些真正‘隔着大海’，眼望‘马来亚山’，‘马来亚水’的，干脆忘掉祖国，不承认祖国，才是优优秀秀的超脱人物。”（姚紫，1987：3）

姚紫是爱国的，这点不容置疑。这位优秀的作家能以任何的地方为他的文本塑造世界，如缅甸，棉兰，新加坡等地，但是他对于故国的珍爱，都融入了人物性格中，与自己的态度有着一致的和谐。

二战时期，姚紫正值年少，中国人民在日军铁蹄下备受凌虐的惨景深深地刻画了姚紫的心中，因此，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创作了无数抗战英雄，他用他的笔触，为抗战英雄点出了他们的色彩，如正义豪气的亚莎菲、饶勇善战的巴克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姚主任、奉献力量的蒋桂花等，他们都是勇敢的，他们都是爱国的，在姚紫笔下显得独特而让人敬佩，为了他们的祖国，他们愿意牺牲自己，这是每一个爱国之士都必须具有的象征。在姚紫叙写〈阎王沟〉之时，曾经有人责备他把中国当时的黑暗毫无隐瞒地给暴露出来，但是他认为，他对祖国的爱是完整的，所以他如此回应：

“在国家的观念上，我始终认为：爱祖国，应该是爱祖国的整体，不是单单爱那维持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或集团……一般来说，我们华侨都有一个单纯而又崇

高的概念，就是：希望祖国兴盛，希望祖国人民的生活安乐。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谁就是祖国的救星！”（刘笔农，1999：233）

姚紫对于祖国的爱是单纯的，无论是战乱时期的中国，政治败坏的中国，还是记忆中那美好的中国，他都爱。在他塑造这些人物之时，他的心中是宽大的，所以各式各样的人物都能是爱国人士，不管身份高低、富贵或贫穷，这些人物都因为他们的爱国精神，而高尚了起来。

姚紫对于祖国的爱深入他的思想当中，在他思念中的中国一切是美好的，在〈半夜灯前十年事〉就能看到姚紫对于故乡的回望。跳开了战火纷乱的二战时期，文本中的“我”与小筠那若有似无的爱情故事就仿佛像是姚紫对于故国的眷念一般，如此地简单而美好。小筠，代表了姚紫心目中的中国，即漂亮又优秀。内战爆发后，小筠死了。小筠死了，代表着姚紫心目中的中国也死了，内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的丑恶与黑暗让姚紫深受打击，最美好的小筠死了，心目中最美好的中国也死了。但是，对于故乡美好的回忆却一直活在了姚紫心中，就像小筠一直活在“我”的记忆当中一样。

“然而，她的影子还没有消失！她的影子附在了我的生命上，居住在我的心中。当情感受到感触的时候，她就轻轻地推开那扇记忆的门扉，飘然走出来……”（刘笔农，1999：222）

小筠留给“我”的回忆是珍贵的，就算人已经逝去，也依然住在“我”的心里。故乡的回忆一直留在姚紫心中，他始终认定自己的祖国就是中国，那美好

的回忆盘旋在姚紫心中，不管时间过了多久，只要思念起中国，那回忆又会再次地涌入他的心中。〈半夜灯前十年事〉虽然是描写了对于初恋逝去的遗憾，但更多时候，触动读者心中的，或许是姚紫对于故乡那始终怀念的回忆。

二、追求真理的路：迷惘与失落

“姚紫一生生活在追求中。他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生，在他作品中表现的这些追求，也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的追求。”（杨越，1997：158）姚紫虽然是提倡现实主义的写手，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不乏看见他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他对社会有着无限的关爱，甚至希望通过作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所以他的作品中（小说）其实不乏拯救者形象的出现，在他塑造黑暗悲惨的文本世界中，带来一丝曙光。姚对秀子、窝浪拉里对兰娜，在不同的创造主题中，姚紫几乎都将拯救者的形象融入于小说的情景当中。虽然他们不是以超人的姿态出现在作品中拯救苦难的女主人翁或是角色，但是他们的思想都具有理想化的真理。

姚在接近秀子的同时其实也不断地灌输秀子思想教育，他希望通过让秀子感受到真理而选择投降于自己。在战火轰隆之地，姚紫不是想要告诉世界日本所发动战争是应该受到抨击的，而是想要通过姚的口气，说出什么才是人类需要并追求的。

“秀子，只要你明白，明白，那战争的反面，不是万人正义的歌声赞美的和平吗？有一天，那和平终要到来的！”（刘笔农，1999：57）

他期待正义，期待着战争结束后，人民所能迎接的美好未来。这与姚紫自身的情感是一致的，姚紫在〈《秀子姑娘》初版后记〉中写下了那么一段话：

“秀子姑娘是死了，但是秀子姑娘的问题并没有死！倘使我们能够揭开那操纵在野心家暴力手下的铁幕。那幕后憧憧鬼影，应该使我们惊心动魄的。我们原就早该明白——人类需要的是什么，人类不需要的又是什么？”（刘笔农主编，1997：223）

姚紫通过了秀子姑娘和姚，带出了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丑陋。人类需要什么？人类需要的是平和而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中，没有残酷的杀戮，没有肆意的掠夺，没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的私欲，这样正义的生活，活在姚的理想之中，更活在姚紫的憧憬之中。

比起姚正义的军官形象，窝浪拉里逃亡者的身份看起来更为不堪，但是，在窝浪拉里身上，却投射出了生活真正的意义。适量的物质能让生活变得舒适，但是过度地追求物质却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理。在逃难途中，窝浪拉里体验过生活真正的意义，在金钱和物欲的冲击下，他懂得如何看到简单生活的美，那朴素和平凡的美好，是女主人翁兰娜所看不到。在生活的困境中，窝浪拉里是兰娜的救赎，他收留了这位被日军凌虐的前殖民者后裔；在迂腐的思想中，窝浪拉里也想要成为兰娜黑暗中的明灯，

“明天！——我们要相信真理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坚信那个自由解放的日子必将来临！那时候，你要更美丽的纱笼，更美丽的胭脂，还怕会没有吗？然而，更使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生命已经熬过漫长的黑暗，熬过苦难的磨练，生命依然健康活泼，没有一丝污点，我们要怎样高兴呢？”（刘笔农，1999：107）

他尝试用温柔与爱去影响这位沉溺在过去物欲生活的女子，让他明白生活中该有的节操，在空闲时给她说文天祥、苏武、郑成功等人的故事，这不是希望在潜移默化下让她得到高风亮节的熏陶吗？在窝浪拉里的想法中，没有战争的明天是美好的，虽然他没有高尚的身份，但是在困境中情操上的高节，却凸显出了姚紫对于人性的另一种期许。

可惜的是，姚紫笔下小说拯救者的形象到最后都会陷入一种迷思中，姚最后错手杀死了秀子；窝浪拉里也被兰娜给抛弃了，这难不成就是拯救者的正义的下场？在他的创作中，现实主义文学没有经受住考验，文学的解放不能代替社会的解放，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意义失落了。（周宁，1997：181）身为现实主义作家，姚紫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所以他没有办法给这些拯救者任何好的结局。在理想的塑造和现实的存在中，姚紫很难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渴望用文学来拯救世界，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具体的。姚紫小说之后的悲剧走向，也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

姚紫在〈失去了神的人——《咖啡底诱惑》后记〉中也描述了自己的痛苦，在这黑暗的社会中，他更是渴求光明，如同他渴望这社会还有友情与温情。姚紫

的心中有着理想的世界，但他却清楚地知道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这样的矛盾冲突，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他没有办法给这些救赎者光明的结局，因为他们依然都活在悲剧的生活底下，苦闷地生活着，所以拯救者堕落了，只剩下了无奈的结局和作者的一把辛酸泪。按照姚紫的创作期来看，这些活灵活现的拯救者形象多数在前期出现，后期所发表的多篇小说，如〈半夜灯前十年事〉、〈新加坡传奇〉等小说都只是在描写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姚、窝浪拉里这样的角色也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生活中无尽的悲哀。

余论：姚紫=黄色作家？

“向色情生活方面找题材的作者，最成功的一个是姚紫（黄槐，贺斧）。”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78：104）

1953年10月12日，新加坡珍珠山区爆出了庄玉珍被奸杀事件，新闻迅速地传至了新加坡各角落，引起当时的轰动与群众声讨。公众除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外，还一致指出造成这一恶性事件的根源，在于黄潮泛滥，黄毒肆虐，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黄孟文，2002：85）这起事件不单单引起了社会的讨论，在文化界更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阵讨伐黄色文艺的反黄色文艺运动的声音。

在事件尚未爆发之前，黄色文艺其实早已沉浸在文学界中多年，只是并没有明确地被定义为“黄色文学”。庄玉珍事件迅速地引发了文学界的声讨，各家开始正视黄色文学的课题，对于“黄色文艺”的看法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军虎在〈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中对黄色作家高度批评，对于黄色作品的定义也在文章的字句中显现，

“……他们张牙舞爪的向那些意志薄弱，思想模糊不清的青年男女们进行围剿。他们的战术是性感、诱惑、裸体、大腿、乳房等，到处腐蚀毒害大批学生们的思想……（军虎，1972：283）

在当时部分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来看，文章中若出现“大腿”、“乳房”等字句，即可引发读者翩翩联想，进而被定为成意涵着黄色思想的文学创作。

但是，在这个时期，爱情与色情的定义开始一直无法变成一个黑与白的局面，更多时候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中。擅长于女性写作的姚紫，瞬间成了众所矢之的对象。的确，姚紫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非常鲜明，也擅长用男女主人翁之间深切的爱情故事作为故事的主干，但是，文学批评家们针对起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他们无限地放大了其中的字眼，如文章中出现的“乳房”、“大腿”等词句，而妄视其创作中的主题意义。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直接点名姚紫为最成功的黄色作家，而姚紫的中篇小说〈窝浪拉里〉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姚紫小说中具有黄色色彩的作品代表。方修的说法，让姚紫的写作生涯中，染上了无以辩解的哀叹。

为了反对黄色文化，蕉风社邀请一些文艺工作者以“爱情与色情”为题进行座谈，目的是在文艺创作中划清两者的界限。（黄孟文，2002：85）最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共识，爱情与色情是截然不同的，能激发人们的情感的那是爱情，而只能给人们肉欲上的刺激的，那是色情。姚紫在〈什么是黄色小说〉中也为黄色小说做出释义，他在文章中应用了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 A·K 瓦西里耶夫的说法为黄色小说和非黄色小说做出了一个区别：

“其（作家）所选择和表现的那些事物和情节，是要显示出被描写的事件后面的观念和逻辑。”（姚紫，1987：13）

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描写，不管是色情的，传奇的，紧张的，都是属于“事物与情节”，作者为什么要写出这些事物与情节呢？那就是要告诉读者们一个中心意思——“观念与逻辑”。（姚紫，1987：13）

姚紫是多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他来说，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只要能够让社会进步，或是真实地表现出社会心态并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与欢迎，那就是好的文学。姚紫对于黄色文化的意识与其他批评家也有着不同，在他看来，色情文学与黄色文学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色情文学可以是黄色文学，但是黄色文学的范围更为广泛，只要会影响社会进步，违反社会规律，让社会变得颓靡和不健康的，都可以被称为黄色文学。

评论家们所针对的部分在于姚紫对于女性人物细致的描写，〈窝浪拉里〉之所以首当其冲成为了姚紫笔下黄色小说的代表，正因为文本一开头，姚紫就先描述了女主人翁兰娜的身体，作为文章的开头。

“棕色的头发，湛蓝的眸子，一双白玉般的手臂撑在特等观台的栏杆上；那抹着红色的口唇嫣然一展，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粲齿，向她身边那个两撇胡子的绅士，笑得那么妩媚……”（刘笔农，1999：89）

“是的，就是她！曾经对我这样笑过——当她站在画架的前面，斜阳的光晕饱满地从阿答屋的木窝外照进来，照着她那美丽的裸体，胸脯上有一颗小小的痣，象一只小苍蝇飞歇在上面，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刘笔农，1999：89）

他们纠结于文本中出现的女性描写，却忘记了〈窝浪拉里〉所带出的社会意义。殖民者的丑陋与社会被殖民的哀叹都被抛在脑后，他们眼里只看得见“裸体”、“胸脯”这类文字，就草草地将〈窝浪拉里〉归纳为黄色文艺，而姚紫所办的《文艺报》更在当时被称作了“黄色刊物”，这样的误解，让人无限感叹。

姚紫善于描写爱情，但他的文笔却点到为止，并不刻意渲染色情情节与色情意向。他笔下女主人都带着背后的社会意义，她们以多样化的姿态出现在文本之中：矛盾的秀子、忘恩负义的兰娜、渴望和平的蒋桂花、爱国的亚莎菲、美好的小筠等等，她们都代表着作者对于社会无限的关爱与内心真挚的情怀。在反黄运动的冲击下，这些细腻的描述却成为了攻击姚紫的武器，他所有的社会关怀都被忽略了，评论家们一味地将他的作品列为黄色作品，这让姚紫笔下的女主人翁们何其无奈，而姚紫又何其无辜呢？

姚紫的小说对于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让他的作品日渐填满了悲剧色彩，拯救者的形象堕落，是无可避免的事。被强冠上抄袭（〈秀子姑娘〉被指抄袭苏联作家拉托列尼约夫中篇小说《第四十一》）和黄色作家的帽子，马华文坛针对姚紫做出的质疑与指责，让姚紫愤怒与伤感的当儿，更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涯。纵观姚紫的作品，在受到了“黄色文学”如此严厉的曲解后，他的写作风格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束缚，尽管他后期的作品依然着重女性人物的刻画，但是，后期的作品中爱情方面的描写减低了，只留下了现实生活的哀叹，和姚紫在理想与现实中无法寻求到平衡的苦闷。

结语

1947年，姚紫带着满腔的热血与情操踏上了新加坡这片土地，并在1948年于《南洋商报》发表了他的得意之作，〈秀子姑娘〉。在那个时期，他从教育工作转而投向了报业工作，主编了多份刊物。寄情于写作的一腔热诚得以抒发并获得肯定，这堪称姚紫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光。

1948年至1954年期间是姚紫最活跃的写作阶段，《南洋商报》于这几年陆续刊载与出版了多篇姚紫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了〈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马场女神》短篇集等。各式各样的女主人翁跃然于姚紫的文笔之下，那栩栩如生的细致描写，更让姚紫的作品变得更为传神与丰富。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位女性代表了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代表了他对于社会与世界的关怀。当然，一个故事并不由一方主宰，男主人翁在细节描写上虽然没有女主人翁们来的丰富与细致，但是在故事的走向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姚紫的铺叙之下，男女主人翁们各司其职，在相辅相成的合作下成就了一个个故事——那些姚紫写给社会的故事。

姚紫用笔墨描绘出社会的事，更鼓励作家们联合起来用文学拯救社会，在这黑暗的社会中达到力挽狂澜的效果。因此，在姚紫前期的作品中读者们都不难看到救赎者的出现，救赎者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社会的黑暗，他们是理想的象征，是传达理想社会理念最好的中间人。姚紫所讨论的社会议题是广泛的，抗战文艺、反殖民文艺、牵扯到现实社会的现实文艺，都成为了姚紫笔下的内

容。他关怀社会理想由心而发，并将自己的理想与社会情怀透射在男女主人翁身上，用这些人物的思想与态度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现象和自己的思想意识。

奈何，姚紫笔下英勇的救赎者堕落了，而这与姚紫自身愈见悲观的心态无法分割的。在创造一个文本的过程当中，作者的思想与思维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他的意识控制了故事的内容与人物的性格。年轻的姚紫背负着满腔的热血来到了这片南洋的土地，年轻气盛的他对于理想的抱负是崇高而伟大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黑暗的冲击，这些理想理念在现实中崩坏了。姚紫坚持现实写作的原则，这与理想社会起了冲突与矛盾，他无法赋予笔下救赎者美好的结局，更没有办法让他们将整篇作品引向光明的未来，因为，现实的故事一直在继续，只要社会一天没有达致理想阶段，这些救赎者就一直活在苦闷的现实社会中。因为这些矛盾与冲突，姚紫困惑了，他的现实主义写法无法赶上理想社会的高度，因此，他迷失了，他的救赎者们也堕落了。

救赎者的形象在姚紫后期的著作中已经不复存在，而马新文坛叩在姚紫头上那顶“黄色作家”的帽子，更让已经陷入迷失中的姚紫郁闷难当。这些挫折明显地影响了姚紫后期的写作，这位擅长于描写男女主人翁之间细腻感情的作家，大大地减低了文本中的爱情成分。虽然这并不影响姚紫的写作能力，但是那神采飞扬、个性鲜明、高喊着理想主义的人物们都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只剩下了一群小人物们在现实生活中挣扎求存的悲哀，这样的创作走向还有姚紫那理想主义的崩坏，不禁让人感到无限唏嘘。

中国文化大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姚紫，他在这段时期中感受到了彷徨。他认为，中国不应是共产党的中国，而应是中国人的中国。（姚紫，1987：8）这位爱国的作家对于故乡的政治起了质疑，但是对祖国的爱却始终深刻地刻画在自己心中，在他后期的创作，〈半夜灯前十年事〉中，读者们就可以发现，这位南来的中国作家，不管身处何方，在一片困境中，依然对于祖国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与思念。故乡在他的心中是美好的，政治的黑暗不会影响他心中最真挚的回忆，他爱的是他的祖国，是一整个祖国。

姚紫是痛苦的，对于外界的批评他无从辩解，而内心的彷徨他也难以倾诉。直至今时今日，姚紫当初的遗憾终于得到正名，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级作家”的他得到了社会和写作者、评论家的关注：他的作品再次获得人们的诠释，他所创办的刊物和培育无数作家的贡献获得了社会的肯定，那顶框架着他的“黄色作家”帽子终于被社会摘了下来。尽管如此，这位优秀的作家的晚年却依然过得凄凉。姚紫晚年已经停止了创作，但他依然心系文艺工作。可惜的是，被癌症折磨的身体限制了他的动力，无法东山再起的愤恨让他的晚年再添悲凉。他临终前所留下的挽联虽然让人感受到无限哀愁，但他对文艺的爱值得让人钦佩，那一股坚持文艺的力量让姚紫更加凸显了他身为作家的气节与骄傲，让读者深深地为他折服。

“五十始知死，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存功，补偿谬误；

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蒿蓬。”

——郑梦周

参考书目

1. 杜丽秋（1999），〈新马华文短篇小说发展略论——海外华文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一集〉，《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联合总会。
2. 范提摩（1972），〈典型与讲话〉，《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3. 方修（1971），《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大众书局。
4. 方修（1978），《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5. 佛斯特（1981），《小说面面观》，广东：花城出版社。
6. 黄槐（1997），〈《马场女神》后记〉，《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协。
7. 黄孟文主编（2002），《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8. 胡菊人（1978），《小说技巧》，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9. 军虎（1972），〈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0. 赖先德（1990），〈典型同类型的区别在哪里？怎样理解典型中的“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文学概论精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1. 刘笔农主编（1999），《姚紫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
12. 马仑（1984），《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13. 苗秀主编（1972），《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2）》，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4. 童庆炳（1992），《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5. 谢克（1997），〈姚紫小说内容提要〉，《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协会。
16. 杨越（1997），〈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姚紫小说简论〉，《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协会。
17. 姚紫（1987），〈什么是好的文艺〉，《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18. 姚紫（1987），〈什么是黄色小说〉，《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19. 姚紫（1997），〈失去了神的人——《咖啡底诱惑》〉，《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协会。
20. 姚紫（1987），〈逃难作家〉，《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21. 姚紫（1987），〈文艺与科学〉，《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22. 姚紫（1987），〈《秀子姑娘》初版后记〉，《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23. 姚紫（1987），〈“秀子姑娘”后记〉，《杂文，这支部队》，新加坡：陈龙玉。
24. 姚紫（1987），《郑梦周诗词集》，新加坡：陈龙玉。

25. 岳潜（1972），〈马华文艺的主题〉，《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26. 赵戎（1972），〈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27. 周宁（1997），〈拯救者形象与现实主义的命运〉，《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